

# 香港意大利社群初探

何偉傑\*

本論文集於研究意大利人在香港的宗教事功和文化活動。最先定居香港的意大利人與澳門關係密切，因為他們是先到達澳門負責在華南傳教的天主教傳教士。他們對本地社群提供醫療支援和教育服務。本地華人及意大利人也組織活動來推廣意大利文化。論文最後討論夏安志家族在澳門及香港與華人融合的情況。

本文是作者自 2003 迄今對香港意大利人的傳教活動、宗教服務與文化生活之初步研究成果。從香港天主教教會的意大利神職人員出發，瞭解他們在香港的傳教活動，然後再論述他們在香港的醫療和教育服務。此外又從香港和意大利兩地的文化人活動入手，介紹他們在香港舉行的交流活動。最後，本文以在香港及澳門為家的著名的意大利夏安志 (Acconci) 家族為代表，展望意大利人在香港的發展處境。

近世意大利人來港的歷史，實可追溯至澳門開埠初期。因為最早期的意大利人都是和葡萄牙人結伴東渡而來的，利瑪竇 (Matteo Ricci) 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因此倘提及香港的意大利人，便很容易聯想到天主教會中的神職人員。事實上天主教教會在香港的外方傳教士中也是以意大利差會的人數為最多。<sup>(1)</sup>

香港開埠之後，最早來港的天主教修會 1842 年的方濟會 (Ordine Francescano)，之後其它修會也陸續來港傳教，例如 1860 年來港的嘉諾撒修會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其成員主要是意大利人。香港的這些意大利傳教士一般都會留在自己所屬的差會組織之下，留在同一個教區工作。因此，我們比較容易找到一些年長的意大利神職人員，作為瞭解香港意大利社群生活的起點。

另外，如果要尋找非神職人員的意大利人的話，由於他們大都喜歡一家兄弟姐妹同在香港大家庭的生活，每逢星期日早上 11 時往往一起到嘉諾撒醫院做彌撒，成為他們社群慣常的聚會時間。香港的意大利文化協會 (The Italian Cultural Society of Hong Kong) 亦大力推動每年舉行一次的“意大利人節” (Italian Day)，為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進行慈善籌款活動，於是香港的意大利人不論是否神職人員都會聚首一堂，成為香港意大利人社群的主要活動之一。

1842 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就教會的行政單位而言，香港也脫離澳門成為獨立的監牧區。在 1969 年之前香港便有五位主教屬於意大利的會士，當中包括高主教 (Raimondi Timoleone, 1867-1894 在位)、和主教 (Luigi Piazzoli, 1894-1904 在位)、師主教 (Domenico Pozzoni, 1905-1924 在位)、恩主教 (Henry Valtorta, 1926-1951 在位) 以及白英奇 (Lawrence Bianchi, 1952 - 1969 在位) 主教。

意大利傳教士的資料仍然有很多保存在“香港教區檔案處”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包括宗座外方傳教會 [ 編號 5-07 至 5-20 ]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簡

\*何偉傑，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導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旅遊文化、文物保護、港澳史、中外關係史(葡萄牙、德國、意大利)、猶太人史和歐洲史。

稱 P. I. M. E.)、慈幼會〔編號 5-23 至 5-26〕(Society of St. John Bosco)、方濟會〔編號 5-31〕(Order of Friars Minor, 即 Franciscans) 機構、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編號 5-37 至 5-38〕(Religious Sisters Congregations: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材料包羅萬有。可惜的是, 有些意大利人不希望把自己的生平公開於眾。<sup>(2)</sup>

### 香港意大利人的早期傳教活動

在鴉片戰爭之前, 香港屬於清朝新安縣管轄範圍。大多數西洋傳教士, 不論是為數眾多的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或是意大利的傳教士, 都是集中在澳門活動, 方濟會士也早在 1578 年於澳門建立教堂及修院。<sup>(3)</sup> 澳門是中國最早有方濟會士傳教的地方, 而且在 1690 年北京及南京的教區相繼成立之前, 已成為中國方濟會最主要的傳教重鎮。<sup>(4)</sup> 鴉片戰爭後, 祇距英國在香港建立殖民地數天之後的 1841 年 4 月 22 日, 羅馬傳信部長愛達莎城 (Edessa) 即宣佈香港為宗座監牧區, 脫離澳門教區, 成為獨立的監牧區, 由此香港教區便正式成立。1842 年, 來自澳門的方濟會士傅安當 (Antonio Feliciani, 亦名裴安當) 被任命為香港第二任宗助監牧 (prefect apostolic), 同時兼任當地方濟會賬房主管 (procurator)<sup>(5)</sup>, 可見香港的意大利人與澳門有着密切的歷史淵源。

這個決定是因為教宗額我略十六世 (Pope Gregorius XVI) 為英軍之中的愛爾蘭天主教徒及傳教計劃考慮, 暫時委任在澳門的傳信部總務長為宗座監牧處理香港一帶的教會工作。當時是請瑞士籍教區司鐸、傳信部駐澳門代表若瑟 (Fr. Theodore Joset) 神父代首任宗座監牧。

1867 年 11 月 17 日, 香港教友人數還是寥寥無幾, 中國籍的祇有六百人, 其次是愛爾蘭籍士兵三百人, 加上葡籍、英籍和其他歐洲人總共僅一千五百人。早期來香港的神職人員不多, 即使在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兩位先導司鐸亦即高神父和雷神父於 1858 年抵港後, 司鐸不足的問題仍無法獲得解決。

就是這樣, 自此揭開了此後一百多年意大利神父以及其他差會來香港傳教的歷史。<sup>(6)</sup>

可惜的是, 羅馬教廷一直未能落實統一組織管理所有香港教會的傳教事務, 引致到 19 世紀後期香港仍然由分別來自瑞士、法國及意大利等五個不同的管理單位分別傳教。根據杜逸民神父 (Dino Doimo) 解釋, 到外地傳教的傳教士都相信三項宗旨: 首先是用拉丁文來表達分別是“向外” (*Ad extera*) 意即向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傳教; 第二是向“異邦人” (*Ad gentes*), 就是到一些未信仰天主的地方傳教, 因此不會在德國、西班牙及愛爾蘭等地方傳教; 第三是“一生人” (*Ad venta*), 意為一位神職人員到了外國傳教, 其工作就是一生一世作奉獻。<sup>(7)</sup>

可能因為香港的傳教事業發展順利, 因此 1858 年宗座外方傳教會來港, 直到 1968 年白英奇主教退任之後, 仍然都有意大利神職人員到港, 但最終目的是要把教務交給香港本土神父。時至今日, 不少意大利神父, 每逢星期一都會在坑口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總部聚會, 他們彼此關係良好, 對社會大眾都十分關懷。<sup>(8)</sup> 這些意大利籍神父有時候會談及意大利和中國的傳教事務, 也會談一些在意大利發生的體育新聞, 例如賽車和足球等。意大利籍神父也會玩一種意大利草地滾球, 這也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內容之一。<sup>(9)</sup>

### 香港意大利人的醫療事功

意大利人來香港傳教者之人數雖然不少, 但當時的意大利傳教士無論對於英國殖民地政府或是本地人來說, 都是陌生的外來者, 因此這些傳教士希望透過提供教育及社會服務以求獲得香港人的信任並建立良好的關係網絡, 旨在為了方便傳揚福音。

香港最早由天主教教會開辦的醫療中心是 1852 年灣仔聖方濟各醫院, 而方濟各會的主要成員亦是意大利人。1860 年 4 月 12 日第一批嘉諾撒修女從米蘭 (Milano) 抵港開始從事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 當中也包括醫療事功。1852 年啟用的灣仔聖方濟各醫



由意大利修會開辦的高主教書院



由意大利修會開辦的嘉諾撒聖心商學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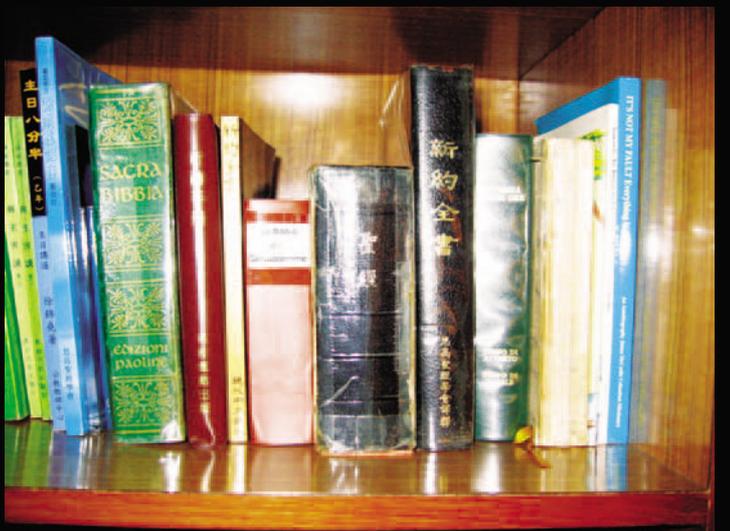
高主教書院（細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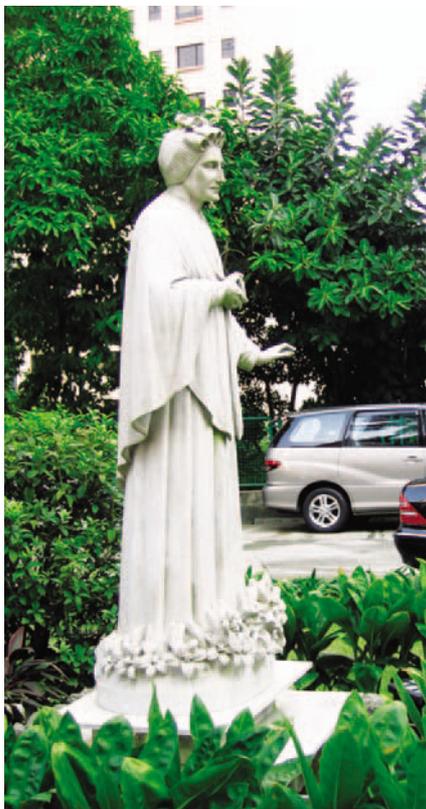
香港嘉諾撒醫院教堂（五樓）



由意大利薩丁尼亞（Regno di Sardegna）國王送贈的主祭臺



香港嘉諾撒醫院教堂中、意、英《聖經》



香港嘉諾撒醫院創會會長聖瑪大利肋嘉諾撒 (St. Magdalen di Canossa) 像

院雖然曾一度關閉，但至 1869 年重開時則由來自意大利的嘉諾撒修女接管。

1894 年香港鼠疫為患，香港島太平山一帶人口眾多，加上衛生環境欠佳，因此災情特別嚴重，嘉諾撒會修女不少人在這次瘟疫中為了救助病人不幸受感染而犧牲，這從香港天主教墳場中他們的集體墓碑中可見當時的情狀。香港政府有見及此購了太平山街樓宇夷為平地改建，實行清潔居所的措施。當時疫患嚴重的地方位於太平山街對上的斜坡，鄰近居賢坊和普慶坊，現已改為卜公花園 (Blake Garden)。

1941 年 12 月 25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佔領香港，很多人離開香港回鄉，教會事工服務活動幾乎完全停頓。但由於當時意大利是日本的盟國，因此意大利傳教士並沒有被囚禁，而當時教會經費主要是從梵蒂岡提供的戰爭救援金支持的，1945 年

8-9 月的戰後重建工程也有賴這筆基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嘉諾撒醫院原有的十六張病床遭破壞，醫院工程在 1960 年完成，於 1991 年轉為香港明愛轄下機構之一，現設病床一百六十張。由於戰後不少華人加入香港嘉諾撒修會，醫療事工於是轉向本地化，迄今祇剩下一名意大利修女護士，她就是嘉諾撒醫院的甘修女 (Josephine Gamba)。(10)

### 香港意大利人的教育事功

香港的教育有不少是由宗教團體主持的，其中也有一些意大利神職人員在天主教學校任職。1860 年 4 月 12 日，第一批嘉諾撒修女從意大利米蘭抵港從事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同年 5 月 1 日便開辦嘉諾撒聖心學校，成為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屬下的一所政府津貼小學。1860 年 5 月 10 日培青中文學校相繼開

課，到1992年1月由羅便臣道（Robinson Road）遷至現今校址，其直屬中學即嘉諾撒聖心書院。

此外，嘉諾撒修會亦在香港開辦了一間意大利修道院（Italian convent）教導神學，在香港出現疫病時則成為難民暫時棲身之所。<sup>(11)</sup>天主教教會的教育工作一直在發展，開辦了不少中學。在意大利香港主教高神父（Raimondi Timoleone）主持教會事務的1871年，政府推出教育資助計劃，竟規定不得教授宗教知識。高神父不滿這一安排，更退出教育資助計劃；幾年之後政府才承認了天主教會在教育工作上

的地位，終於改變資助條件，容許傳授宗教知識。

意大利神職人員在香港教育中擔任的角色，其實不容忽視。例如，杜逸民神父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來曾經在長沙灣、大埔和香港仔等區的學校教堂工作，1965年在跑馬地天主教小學當過校監，也教過《聖經》。1967至1971年，杜逸民神父在油麻地聖保祿學校當校長，之後到美國學習，1977年到1985年在新蒲崗五華書院工作，1992年到1997年回意大利，最後回港於1997年到1999年在恩天主教書院擔任校董會職務。<sup>(12)</sup>



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墓園小教堂入口



香港嘉諾撒醫院會徽



香港嘉諾撒醫院大堂



堅道天主教堂總堂大門

最後一位意大利主教白英奇神父在 1956 年曾經說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大學有 11% 學生是天主教友，而 40% 是來自我們的中學。在 1950 年代，天主教佔香港總人口不足 4%。”<sup>(13)</sup> 由此可見教育事業對傳教的幫助，當中也包括了意大利神職人員的功勞。

至於意大利人如何評價香港的學生？杜逸民神父從事教育工作多年，他對香港的學生印象是：他們時時很勤力做功課，連小學生也要默書和做練習；反觀他自己在意大利的小學生活祇以遊玩和運動為主。杜神父 60 年代初來香港時，香港社會仍然十分貧窮，很多學童沒有書桌，祇好蹲在反轉的紙皮箱旁做功課。

### 香港的意大利文化交流活動

近代有論者認為中國和意大利的關係是與別不同的，因為兩國交往無不以溝通文化提高精神為前提。<sup>(14)</sup> 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不過亦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之地，意大利文化亦交融於其中。

因此，在意大利的神職人員之中，除了一般的宗教、教育和醫療工作外，也有一些是從事其它文

化工作的，例如麥兆良（Fr. Rafael Maglioni, 1891-1953）神父對香港的史前文化很有研究，已把他在粵東考古的心得出版成書；而且他在南丫島發掘的史前文物亦保存下來藏於香港歷史博物館。<sup>(15)</sup> 香港最早的地圖是 1866 年由意大利傳教士華倫泰理（Simon Volonteri）神父及其友人 Christopher Negri 完成的<sup>(16)</sup>，還有一位南懷謙（Leone Nani）神父曾在兩湖地區拍攝歷史圖片，不過這兩位對文化有很大貢獻的神父，都不是以香港作為他們最重要的傳教地點。1948 年夏天，方濟會的舒迺伯神父（Alphonse Schnusenber）曾把方濟會的中國語言學校遷到澳門，把北京的聖經學會及藏

書移到香港，但舒迺伯並非意大利籍方濟會士，卻留意到香港和澳門在文化上的近似性。<sup>(17)</sup>



堅道天主教堂總堂內景之一



聖道天主教堂總堂內景之二

除了香港史前文化是意大利神職人員努力鑽研的對象之外，亦有一些香港文化人希望引進意大利文化，加強居港的意大利社群與本地人的溝通，其中最著名的是現任香港意大利文化協會會長、身兼東華三院歷屆主席逾三十多載以及香港童軍總會名譽會長等多項社團公職的李東海太平紳士。

李東海博士創立意大利文化協會，深得香港人和居港意大利人及意大利政府贊許。早在1966年李會長便得到意大利總統頒授意大利騎士勳銜，在1969年獲意大利總統頒授意大利官長勳銜、1972年得意大利總統頒授意大利司令勳銜、1976年獲意大利總統頒授意大利大長官勳銜、

1988年獲意大利總統頒授意大利最高榮譽大十字騎士勳銜；李東海博士還是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政協文史委員會香港組負責人，曾撰寫《香港太平紳士和申訴專員》及《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18)

根據李東海博士回覆筆者的信函所悉，意大利文化協會起源於羅馬，於1889年成立，協會取名“Società Dante Alighieri”（但丁學會），以紀念意大利偉大詩人、文學家、道德哲學家及政治思想家但丁（1265-1321）。意大利文化協會之宗旨是將意大利語言文化推廣至世界各地，已於海外設立共約三千三百所語文學院及文化交流中心，當中七十五所位

於非洲、二千一百所位於美洲、四十二所位於亞洲、八百四十所位於歐洲以及二百一十二所位於大洋洲。

香港意大利文化協會於1954年成立，於1967年曾經停頓正常運作。意大利文化協會的服務對象包括對意大利古今文化風貌有興趣的人士，以及僑居海外並希望與家鄉保持聯繫的意大利人。現時香港意大利文化協會的會址設於香港灣仔，內含學習意大利文課室及圖書館，此外該會亦向公眾提供意大利文翻譯及即時傳譯服務。1972年意大利政府邀請李東海博士重振該會會務，並推舉其為會長至今已逾三十年。箇中因緣可從50年代自李東海博士開始在香港營商、成立東泰集團的時候說起。當時李東海博士主要經營進出口貿易生意，包括香港、意大利、日本三角貿易，由意大利出口食品原料輸往日本，出口本港輕工業製品及國內土產，以及進口各國電器材料及家用電器包括60年代代理歐洲多國著名電器產品，例如家傳戶曉的意大利“雪白牌”雪櫃。

李東海博士除了參與開拓港意雙邊貿易之外，對於推廣社會福利事務亦不遺餘力，例如1967年意大利發生水災，李東海博士曾義舉救災率先響應捐輸；加上他在社會慈善及文化活動方面盡心盡力，故此意大利政府邀請他榮任香港意大利文化協會會長。李會長與意大利駐港總領事館保持緊密合作，會務獲得總領事館的積極支援。1968年，香港貿易發展局首次組成龐大商業代表團前住意大利參展，特邀李東海博士出任團長，參加在米蘭舉行的國際貿易博覽會。李東海博士又於1972年應意大利政府邀請出任商業考察團團長前住意大利考察，促進了港意兩地之間的貿易關係。

李東海博士出任會長後，首先創辦意大利語文學習班，積極推廣意大利各項文化藝術活動，例如舉辦音樂會及藝術展覽會，邀請著名學者作專題演講，每年舉辦大型慈善餐舞會籌募善款。當然，意大利文化協會贊助項目包括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香港兒童癌病基金會、香港復康會、世界文物基金會及希望工程等。此外，李東海博士在1972年出任會長之時，捐款設立“李東海獎學基金”，每年撥款資助成績優異之香港學生赴意大利

深造語文及有關藝術和設計之科目。香港意大利文化協會多年來的工作重點亦在於鼓勵華人學習意大利文，不少就讀該會學校的學生，除了因工作需要之外，亦有不少是希望藉學習意大利文從而深入瞭解及欣賞意大利的文化，諸如意大利歌劇、音樂及繪畫等藝術。<sup>(19)</sup>

### 中意合璧的夏安志 (Acconci) 家族

李東海博士曾向筆者提及香港有一個夏安志家族已居港四十年之久，是意大利文化協會活動的支持者。<sup>(20)</sup>中意合璧的夏安志 (Acconci) 家族來自意大利比薩 (Pisa)，其家族史是由一位藝術家夏剛志 (Oseo Acconci) 開始的。他1936年來港，學了六個月英文，之後到上海的上海匯豐銀行工作，後來因他接了一項和平飯店的建築工程，於是返港於1937年和朋友開辦雲石公司，專門進口意大利雲石加工出售。到了1963年，夏剛志的生意交給子女打理。他們一家都會說廣東話，因此在香港和澳門做生意如魚得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實夏剛志先是在澳門從事建築工作，後來才到香港。根據澳門著名史家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在1960年代的研究指出，澳門“聖若瑟堂於1903年和1953年都被耶穌會士重修過，最後一次翻修是 Oseo Acconci 主辦的，正門前有塊大理石，上面刻有拉丁文字樣：耶穌會士神父行了本堂奠基禮，獻給聖若瑟，由1746年開工至1758年竣工；1903年重新翻修裝飾。而聖若瑟教堂位於澳門風順堂上街，與聖若瑟修院合稱三巴仔或小三巴。這教堂由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於清乾隆十一年 (1746) 開始興建，1758年落成。之後在1903年重修，最後在1953年由羅若望 (José da C. Nunes) 主教再行修葺。

夏剛志共有十五名子女，在香港的包括排行第九的 Arnaldo Acconci，負責工程設計，並且繼承了其父的藝術才華。他來港三十二年，除了從事建築設計工程之外，亦參加藝術工作，例如在大會堂歌唱義演，以及為扶康會從事慈善活動。夏氏家人



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墓園入口



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墓園小教堂



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墓園入口對聯



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墓園嘉諾撒修女墓地



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墓園麥神父骨殖

認為，意大利文化在香港是十分受歡迎的，從 Amani 時裝、Prada 手袋、法拉利跑車到意大利足球、意大利薄餅及意大利粉，皆大行其道。

Arnaldo Acconci 表示，意大利人和其它民族是很容易融合的。例如，他們一家都是在香港和澳門工作生活，能夠說流利的粵語。尤其是在澳門出生的夏利奧 (Julio Acconci) 和夏健龍 (Dino Acconci)，都畢業於澳門粵華中學，後來組成 Soler 樂隊在港澳及臺灣發展。排行第十二的 Lancilotto Acconci 認為，他的家庭已經和本地人融合了，他的夫人是中國人，他的女兒 Gemma Acconci 也有一個中國名字叫作夏智美。他們家族成員和朋友都願與香港人談戀愛，甚至有不少和香港人結婚成家，因此說不定再過兩三代之後，會有很多 Acconci 的家庭成員擁有中國人的血統。

### 餘論

香港意大利社群有兩個最明顯的特色。第一是教會神職人員，他們都是有組織的社群成員，互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甚至他們的人際網絡主要就是意大利神職人員，或是和教會群體有密切往來的信眾。不過，這些意大利社群的成員會漸漸因年老或者被派到新的傳教地點而不斷減少。

其次是意大利的非神職人士，由於能夠自由選擇配偶和伴侶，於是出現了與香港本地人通婚成風的現象，大大地促進了意大利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血親融合。這種情況有如四百多年以來的葡國人，在澳門和中國人通婚融合，結果產生了兼通中西文化的澳門土生葡人。

於今雖說香港本地教會已非由意大利人主導，不過他們在香港的影響仍然是深遠的。白英奇主教回顧任內香港教區的發展時，發現天主教教友總數從 1951 年的四萬三千增至 1968 年的二十三萬五千；1951 年港九堂區僅有十二個，至 1968 年增為二十七個，另獨立小堂區六個；新界的傳教區在 1951 年祇有七個，1968 年增至十四個；天主教學校從 1951 年的七十間發展至 1968 年竟有二百二十五間，亦可見其事功之成就。<sup>(21)</sup>

### 【註】

- (1) 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 著，徐牧民譯：《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教四百週年》，澳門：大華書局，1964，頁 29。
- (2) 這種低調的作風也使人出乎意料。詳見江瓊珠：《從米蘭到鑽石山：甘仔故事》，頁 4，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1997 年。我們找到杜逸民神父 (Dino Doimo) 訪談之前，我們曾經接觸過五位年過七十曾在香港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神父，但都認為他們已經退休，或者記憶力衰退因而不願意接受訪問。
- (3) (4) (5) 方濟會士金普斯 (Arnulf Camps) 及麥克羅斯基 (Pat McCloskey) 合著：《方濟會來華史 (1294-1955)》(The Friars Minor in China; 1294-1955)，香港：香港天主教方濟會，2000，頁 4；頁 6；頁 12。
- (6) 《公教報》社論：〈發揚高主教精神〉，《鐵筆七十年：公教報社論選輯》，《公教報》，頁 12，1998 年。
- (7) (9) (12) 訪問杜逸民神父、何偉傑採訪及紀錄，〈一生對海外的異邦人傳教：杜逸民神父談意大利神職人員的教育工作〉，2003 年 3 月 19 日於坑口的宗座外方傳教會將軍澳活動中心。(未刊口述歷史訪問稿)。
- (8) 江瓊珠：《從米蘭到鑽石山：甘仔故事》，頁 33。
- (10) 關於過去意大利修女護士的事跡及其工作，詳見訪問甘修女、何偉傑採訪及紀錄，〈香港現在唯一的意大利修女護士甘修女 Josephine Gamba〉，2002 年 12 月 27 日年於香港嘉諾撒醫院。(未刊口述歷史訪問稿)。
- (11) Nora M. Clarke in collaboration with Sister Lina Riva, *The Governor's Daughter takes the Veil, Sister Aloysia Emily Bowring, Canossian Daughter of Charity, 1860, Hong Kong, 1870*,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Historic Archives, 1980, p. 129.
- (13) 基德多 (Piero Gheddo) 著、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譯：《白英奇主教傳》(Lorenzo Bianchi di Hong Kong)，頁 133，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2 年。
- (14) 薛光前：〈中義關係的尊貴〉，載劉文島等著：《中義文化論集》，頁 1，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 年。
- (15) 基德多 (Piero Gheddo) 著、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譯：《白英奇主教傳》(Lorenzo Bianchi di Hong Kong)，頁 91。
- (16) 蕭國健：《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頁 28-9，1994 年。
- (17) 方濟會士金普斯 (Arnulf Camps) 及麥克羅斯基 (Pat McCloskey) 合著：《方濟會來華史 (1294-1955)》(The Friars Minor in China (1294-1955))，頁 210。
- (18) 可參考李東海編撰，《香港太平紳士和申訴專員》，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年及李東海編撰：《香港東華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略》，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年。
- (19) (20) 詳見李東海博士於 2003 年 4 月 10 日致何偉傑函。
- (21) 〈向白主教致敬〉，1969 年 4 月 18 日，〈發揚高主教精神〉，頁 18，載：《鐵筆七十年：公教報社論選輯》，《公教報》，1998 年。